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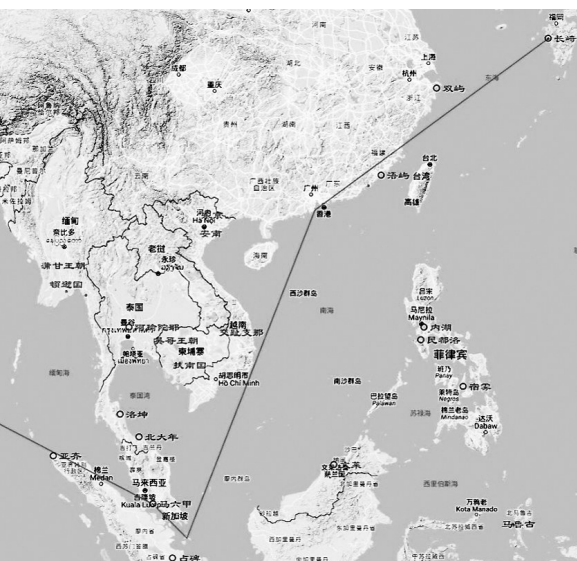
魏之琰:将明乐传向日本的福建大海商

他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大海商,纵横17世纪的东亚海域30多年,赫赫有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要避其锋芒。他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,不仅邀请黄檗隐元禅师东渡长崎,还将明代传统礼仪音乐传入日本,其后人编撰整理的《魏氏乐谱》,是难得一见的有板有眼的工尺谱,让今天的人得以“按图索骥”还原明代音乐的样貌。但除了相关学术界,魏之琰这个名字,依然少有人知。

魏之琰活跃在17世纪中晚期的东亚、东南亚海域。当时,这片地区已经呈现出“全球化”的初步面貌。他和他的哥哥魏之瑗经营着从日本长崎至安南国(越南古称)的丝绸贸易。他们每年1-2月份乘着东北季风,沿着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向南航行,经过海南岛的南部和越南海岸线到达北越,经由内河抵达贸易城市宪庸(Phố Hiến,在今越南兴安省)购买生丝和各种丝织品,待到七月再抓住西南季风的尾巴返回长崎。

他们既是日本皇室、幕府等统治者和富裕阶层高端奢侈品的买手,为日本丝绸产业提供持续不断的货源,也是安南国重要的白银、黄铜贵金属的提供者。在此过程中,他们还要与远道而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。

原本,在丝绸产业的世界地图上,越南是可以忽略的点。众所周知,中国的江南一带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生丝和丝绸产地。但是,随着清军入关,原本富庶的江南经济社会遭到破坏,逼迫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将目光投向越南。



▲17世纪东亚、南亚的贸易地标。

17世纪40年代,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发了越南的生丝原料市场,几年后,以福建泉州籍的郑氏集团、福州福清籍的魏氏兄弟为代表的中国贸易商也加入了竞争,很快荷兰人就败下阵来。1647年-1648年,豪横的中国人连续两年以高价“扫”光了安南市场上质量最高的丝制品,剩下的才留给荷兰人。1653年,荷兰人终于凑齐了25万两资金,但这一年五艘来访的中国帆船一口气拿出了40万两白银。

尤其是,到了60年代,郑成功率军收复了台湾,让荷兰人丢掉了东亚最重要的贸易站和补给地。为了重组他们的亚洲业务,他们铤而走险,计划夺回安南丝绸贸易的控制权。他们不敢打郑氏集团的主意,就把矛头对准了魏之琰的帆船。

1664年5月,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总督下令炮舰“胡赫兰登号”在宪庸通往入海口的内河巡航,阻



▲1684年千呆禅师绘魏之琰像。

(图片来源:饭冈直子,《学者与豪商:魏之琰与东京和长崎的丝绸贸易》)

止完成交易的两艘魏之琰的风帆入海返回长崎。他们认为,一旦这两艘船无法回到日本,幕府将会对魏之琰的商业信用产生怀疑,加上购买丝绸和生丝的资金无法及时回笼,一定会对魏之琰的生意造成严重的打击。

不过,令荷兰人没有想到的是,比魏之琰更着急的是安南国和日本的统治阶层。一方面,日本官员在魏之琰的船队中有股份,因延期而造成损失是他们绝对不愿意见到的。另一方面,由于当时的安南国处于南北交战的状态,北越的统治阶层需要大量的白银充当军费,如果丝绸市场失去了魏之琰的有力竞争,将会由荷兰人获得定价权,对丝绸产品的销售价格明显不利。

另外,无论是日本还是安南国,都处于同一个中华文化圈中,它们对中国商人更为友好,连荷兰人都承认,在与安南国和日本的贸易中,“懂中文是一种优势”。

于是,好笑的一幕上演了。虽然两艘商船被困回不来,可身在长崎的魏之琰仍在不慌不忙地造新船。第二年,新船造好,开往安南国,照样贸易。而北越的统治者特意为魏之琰的帆船颁发了特许通行证和船旗。在此强势的态度下,荷兰人不得不撤出炮舰,放任魏氏的帆船入海。

1664年的安南内河航道上,一艘荷兰炮舰对两艘中国风帆历时2年没有硝烟的“禁运”,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不再被人提起。可它展现了17世纪全球化初期两个大型商业集团在亚洲海域的正面交锋,一个是以家族、地域为纽带的福建地方商帮,一个是举国之力打造的跨洋商业“巨舰”,他们所要争夺的是世界丝绸的产地归属。经此一事,魏氏帆船在安南国再无阻碍,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眼见占不到便宜,明智地选择了避让的策略,转而在孟加拉开发新的丝织品产地。

1664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。隐元禅师在日本京都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给魏之琰写了一封信,隐元禅师写道:

然此时唐土正君子道消之际,贤达豪迈之士尽付沟壑,唯吾辈乘桴海外得全残喘,是为至幸。

从这封信中,我们能看出隐元将魏之琰视作乘桴海外的同道中人,他们是福清老乡,先后离开故土,在海外“得全残喘”,其中惺惺相惜之意,溢于言表。

实际上,魏之琰不仅是隐元的老乡,还是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大檀越。他所在的长崎福清华侨社团,更是力邀隐元东渡的幕后推手。

早在16世纪,长崎就是海外华人的主要中心。到了17世纪中叶,由于日本锁国政策的实行,只有中国和荷兰商人才能在长崎一地进行进出口贸易。而魏氏兄弟,就是久居长崎、专营对日贸易的海商集团领导人。

随着中国人在长崎的聚集,中国佛教也随之传入。长崎最古老的寺庙是兴福寺,是浙江、江西和江南地区的侨民建立的,也被成为南京寺。不久之后,闽南的移民建立了福济寺,也叫泉州寺、漳州寺。1629年,福清、闽侯和长乐的侨民在长崎建立了第三座寺庙——崇福寺,也被称为福州寺。在建立之初,福清魏氏家族就与另外三家(王、何、林)给予了最大的支持。

如今在长崎崇福寺中,依然保留了许多魏氏兄弟捐资修造的文物,如崇福寺梵钟的铭文记录了魏之琰于1647年时出资一百五十两白银参与了捐铸,为捐资者中最多。承应三年(1654年),隐元禅师最终决定接受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之邀东渡日本弘法,次年隐元禅师出任崇福寺住持时,迎接隐元禅师晋山的檀越代表中就有魏之琰。

魏之琰一生以“明人”自居。据记载,作为长崎巨富,他的宅邸“凌云阁”是一座明代中式风格的建筑,亭台雕栏均斥巨资由中国运来。他前往日本时还携带了明代的乐器,在家中教授两个儿子学习明朝学校的音乐,感怀家国之情。

他与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朱舜水交情不浅。朱舜水寓居长崎期间写有《答魏九使书》(“九使”为魏之琰别称),其中记录了向与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相厚的魏之琰寻求帮助的情况。后来,朱舜水被德川光圀礼聘为宾师,在江户和水户之间讲学传道。他的朱子学说在日本开花结果,不仅促成日本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“水户学”的发育、成熟,也使儒家文化在海外焕发出别样生机。

而魏之琰自己,“无意之间”也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。在长崎时,他热心当地公益事业,他对长崎社会的贡献使其在日具有很高的名望,更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重视。1672年,魏之琰应内里(皇宫)邀请前往京都御前演奏明乐,使明乐开始逐渐流行于日本贵族阶层,因此他也被称为“日本明乐之祖”。



▲2019年《魏氏乐谱》演出的主创团队,右五为魏氏后裔魏若群先生,左五为《魏氏乐谱》整理者漆明镜教授。(周世玉 摄)

在魏之琰去世后,他的四世孙魏皓在日本京都传授讲习,让明乐的影响力逐渐扩大,拥有了以画家宫崎筠圃为首的多达百余人的门生,受到了关白大臣近卫内前的欣赏。在近卫内前的授意和推动下,明乐风靡于京都贵族阶层间,自王侯以至士人受其传者可以百人计。在学徒不断增多的情况下,为减少抄写乐曲的不便,魏皓编辑刊行了《魏氏乐谱》。除乐谱外,还有记载明乐演奏使用之乐器和表演形式的《魏氏乐器图》。

《魏氏乐谱》中收录的明代乐曲,在国内多已失传。清末,一些留日学生将其中若干篇传回国内,逐渐引发国内音乐学者,如古琴大师杨荫浏先生等的重视。因《魏氏乐谱》除了用工尺谱标记音调外,还注明了“板”“眼”节奏,成为了复原明代乐曲的重要资料。2011年,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漆明镜先生的《魏氏乐谱》解析·凌云阁六卷本全译谱》。自此,大海商魏之琰17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的“明乐”终于再次呈现在中国人眼前。

魏之琰与兄长合葬于日本长崎,他的后人生活在日本,改日本姓“钜鹿”,源自中原魏氏一族的发源地。(赵凯)